

沙捞越客家人的移民、聚落形态与社团组织论析

田英成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马来西亚 沙捞越 96000)

[摘要] 客家人是沙捞越最早的移民群体, 主要分布在沙捞越的古晋、三马拉汉及美里省等地。早期移居到沙捞越的客家人, 延续着在中国聚族而居的形态。在人地生疏的异乡环境中, 沙捞越的客家人为了互为济困, 成立了社团组织, 并发挥着教育同乡子弟、举办慈善事业等角色与功能。

[关键词] 沙捞越; 客家人; 移民; 聚落; 社团

[中图分类号] G12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4)02-0034-07

Analyses on the Immigrants Settlement Pattern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of Hakka in Sarawak

Tian Yingcheng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Sarawak, Malaysia 96000)

Abstract: Hakka was the earliest immigrant in Sarawak, mainly distributing in areas as Kuching, Kota Samarahan and Miri Province in Sarawak. Hakka immigrated to Sarawak earlier kept living as a big family as they lived in China. Hakka in Sarawak set up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supporting each other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It also functioned to educate fellow students and operate charity business.

Key words: Sarawak; Hakka; Immigration; Settlement; Community

绪言

沙捞越位于婆罗洲(马来语: Borneo)西北部, 总面积 124 449 平方公里, 是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一州。沙捞越早年原是英国殖民地, 1963 年 9 月 16 日与马来半岛、新加坡、北婆罗洲(沙巴)一起合并组成马来西亚。(新加坡于 1965 年后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沙捞越土地广阔, 石油、矿产、煤气及森林资源丰富。华族在 1840 年前即开始移民到这片土地, 为这片土地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客家族群是沙捞越最早的移民群, 梅县人罗芳

伯十八世纪在印尼西婆罗洲建立兰芳共和国逾百年, 其余众在十九世纪初不断涌入沙印边境的石隆门(Bau), 在当地组织公司, 从事采矿与种植业。1840 年, 英人布洛克从汶莱苏丹手中取得沙捞越统治权后, 石隆门已是具有数千人的市镇。1857 年, 发生震撼布洛克政权的石隆门华工起义事件, 其领导人与群众也多为客家人。

迄今, 客家人约占沙捞越华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他们的祖先来自大埔、惠来、揭西河婆、嘉应五属及惠州等县, 而以揭西河婆客占最多数。

早期客家人从事采矿业, 但他们更是著名的农耕者。古晋、三马拉汉及美里省的农垦区, 大部分

[收稿日期] 2014-05-11; [修回日期] 2014-06-10

[作者简介] 田英成(1940-), 男, 马来西亚资深报人、作家。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马来西亚华人史。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为客家人经营,他们从事胡椒、树胶、椰子、油棕的种植,以及养殖业,对农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本文旨在论述沙捞越客家移民,村镇聚落形态的形成,以及客家人及其社团组织如何保持华族文化和国家认同?同时,也对客家人与其他方言群体的和谐状况作出相应的考察。

一、早期的客家移民

勤劳苦干的客家民系,在战乱与生活逼迫下,不断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辗转流徙到赣南、闽西及粤东的山区谋生定居。为了寻找更好的生路,自唐宋以来,即不断远徙南洋,印尼、马来半岛及婆罗洲一带,都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

当沙捞越还是属于汶莱领土的1830年代,已有不少华人从荷属的西婆移入石隆门,他们多是广东嘉应州客家人。他们进入石隆门从事开矿及种植为生,也组成自己的公司——十二分公司,这是石隆门聚落以后慢慢扩大的基础。

詹姆斯·布洛克统治沙捞越后(1841-1867),华人开始大量移入,客家人是最早的移民群。1850年,大约有三千名华人,从荷属的三发与坤甸移民石隆门,他们多数是罗芳伯统治下“兰芳大统制”的余众,这批移民大多数是矿工和农民。他们抵达石隆门后加入“公司”,少部分则迁移到伦乐一带垦殖^①。

这批三千人的移民,可视为第一批大规模的华族移民,其人数到1857年增至四千人左右。他们新建立起来的“公司”势力也越来越大,拉者(意即国王)想尽各种办法来管制他们,但由于采取高压手段,终于促使爆发了1857年石隆门华族矿工的武力反抗。这场武装反抗运动,由客家人刘善邦及王甲领导,群众也多为客家矿工与农民。武力反抗事件最终被布洛克政权镇压,不少矿工被活活烧死^②,一些则逃往西婆三发和坤甸去。

尽管石隆门华工事件使拉者对华族移民存有戒心,但他认识到没有勤劳的华族劳工与农民,沙捞越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动乱也把拉者政府的

人力物力几乎消耗殆尽,弄得国库空虚。而石隆门公司的覆灭,也失去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拉者明白其财政之困境,了解到只有藉华人的勤勉开发,才可以重振旗鼓。因此,拉者改变了政策,采用比较温和的态度去对待华人。在此政策下,拉者鼓励华商发展出口贸易,把沙捞越农产品运销新加坡,又支持他们开发众多的胡椒园和甘蜜园,以及帮助他们发展硕莪粉(sago)的业务。由于这个原因,不久之后,先前离开石隆门与古晋到三发与坤甸避难的华人也就陆续返回石隆门及古晋重振家园,并且带来不少新客。

华人大量移民沙捞越,是1868年查理士·布洛克(Charles Brooke)继任拉者之后的现象。查理士·布洛克继任统治者后,继续扩张领土,极需劳力开垦,因此尽力吸引华族移民,鼓励垦殖。虽然查理士·布洛克曾亲自联合伊班族武士,成功地镇压了石隆门的华工起义,但他对华人仍有较高的评价,认为引进华人移民是解决经济难题的可行路径。查理士·布洛克在1874年8月1日出版的《沙捞越宪报》这样写道:“我们认为婆罗洲未来的发展只有靠华人才能完成。古晋及其他地方用砖瓦筑成的漂亮的巴刹(市镇),全由华人建造。我们应该感激华族苦力劳工、技工,还有那些热心贸易,对国家发展贡献很大的华人,他们比苏格兰人更有进取心……”^③

1863年所颁布的《沙捞越土地章程》,是布洛克政府土地政策的依据。查理士·布洛克对这个章程作了些修订,这对鼓励华人移民的到来,以及吸引相距不远的新加坡的华资流入沙捞越,特别是为此后沙捞越大规模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根据此土地章约,第一批集体移民的华人在1898年抵达,他们是客家人,共有一百名。这些客家人是巴色会(Basel mission)的信徒,在古晋以南三里分配到一百五十亩良好土地,开始种稻^④。合约规定他们必须种植稻米,政府也给予他们土地、开办的费用和建筑材料。然而,这些客家人不久即改种蔬菜和饲养家畜。同时,他们也举办其他活动,包括协助该地的英国圣公会尽心做传教工作,

^①石隆门有一山洞叫“鬼洞”,1857年的动乱,有千名以上的华人,包括妇孺,躲进山洞避难,被参与镇压的土著在洞外放火窒息而死。此洞迄今仍有许多骨骼碎片。

^②见《沙捞越宪报》(Sarawak Gazette)1874年8月及1874年12月出版;

^③见《沙捞越宪报》1898年9月出版。

为此拉者颇感不悦。不过这些客家人在其领袖和教师江贵恩(kong Kwei En)带领之下,终于打消了政府的不满,成功地发展了他们的事业。江贵恩因此在古晋华人社会中颇负盛名,1909年成立的启明社,他是领导人之一。这批客家人来自广东省的东莞、宝安及惠阳等县份,他们的许多后裔,至今仍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及附近三里的地方。

客家人除了1898年的一次集体移民之外,更多的是自由移民。满清末年,中国海禁解除,华南地区的居民涌往东南亚国家。民国期间,中国向海外移民持续增加,这与中国政治上和社会动荡相关的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分不开。连年战争、各自为政的军阀对农民横征霸敛,肆意掠夺乡村经济,既妨害了农民耕作,又干扰了经济复苏,加上自然灾害,导致农村破产,农民生活凋敝,与海外有乡亲关系者,就不断南来。

随着海外华侨人口的不断增加,到二十世纪

的二三十年代时,在许多迁入国已形成了被称为“华侨社会”的移民村落。这种村落对以后由中国外迁的移民有着重要作用,这就是凭着地缘、血缘关系,吸引着更多同乡与同宗向同一地区外迁。

依据1947年沙捞越的人口调查,客家人是华人方言群中最大的族群,人口是45 409人,占华族总人口的31.2%,比福州籍人口的41 946人多3 463人^[2]。

1970年,沙捞越华族人口达到294 220人,客家人有91 610人,占华族人口的31.2%,较之福州人的90 704人多906人^[3]。但1980年代以后的人口调查,福州籍人口已超过客家人少许,这可能有如下原因:80年代之前,拉让江流域的共产党武装活动导致局势紧张,其时福州人多居住在这一地带的乡区,因此,具体的人数调查受到局势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当地的局势趋于稳定,人口调查也得以进行。

表1 1970年以县份划分之沙捞越华族社群人口

县份	广府人	福州人	客家人	兴化人	福建人	海南人	潮州人	其他	总数
伦乐	258	64	1 530	15	181	182	606	496	3 332
石隆门	116	16	7 941	99	120	144	302	9	8 747
古晋	3 911	4 896	50 647	4 666	15 724	3 860	17 401	4 352	105 457
西连	56	90	7 714	20	215	37	513	613	9 258
实文然	45	483	1 639	6	351	129	165	349	3 167
第一省	4 386	5 549	69 471	4 806	16 591	4 352	18 987	5 819	129 961
成邦江	140	2 209	1 790	83	513	205	2 219	535	7 694
鲁勃安都	15	65	1 287	2	15	12	523	7	1 926
砂里末	32	294	1 251	9	270	134	952	47	2 989
加拉卡	212	417	456	8	1 082	176	192	106	2 649
第二省	399	2 985	4 784	102	1 880	527	3 885	695	15 258
泗里街	5 010	11 439	242	88	623	29	63	22	17 516
民那丹	771	11 988	107	11	720	75	159	404	14 235
诗巫	4 014	42 997	3 814	4 727	5 221	468	1 235	591	63 067
加拿逸	2 273	1 567	353	41	1 016	36	8	212	5 506
加帛	166	2 318	540	11	1 142	16	44	20	4 257
木胶	199	1 706	146	151	1 958	145	327	227	4 859
第三省	12 433	72 015	5 202	5 029	10 680	769	1 836	1 476	109 440
民都鲁	320	3 094	387	83	303	149	1 170	126	5 632
美里	2 818	2 734	10 595	450	3 504	902	1 083	1 151	23 237
巴南	131	2 685	612	43	1 426	141	176	147	5 361
第四省	3 269	8 513	11 594	576	5 233	1 192	2 429	1 424	34 230
林梦	149	1 269	422	95	986	116	74	56	3 167
老越	58	373	137	34	1 148	77	50	87	1 964
第五省	207	1 642	559	129	2 134	193	124	143	5 131
沙捞越	20 694	90 704	91 610	10 642	36 518	7 033	27 262	9 557	294 020

资料来源:《1970年马来西亚人口及家庭调查》吉隆坡统计部1972年3月,第99-103页。

表1说明沙捞越各方言群体的地理位置。据该资料显示,古晋县的客家人占55.2%。事实上,连同石隆门县及美里县,当地的客家人就占了全沙捞越客家人的75.5%。2000年以后,客家人估计已近20万人,其人口流动并不显著,迄今仍多居住在古晋县及美里县。福州人则是沙州境内迁移最频密的方言群,他们从拉让江流域迁移至民都鲁、美里、林梦、古晋等城镇。

二、客属村镇的聚落形态

海外华人移民群延续中国聚族而居,同一村落甚至是单一姓氏的形态,这种形态在海外固然有一定程度变化,但聚族而居在早期移民社会中却是一种常态。同一方言群他们的语言交流,传统习俗文化相近,可使他们在生活上互相照应。在石隆门,这是最早客家族群移民进入的地区,他们在此采矿、农耕及简单的商业营运,还可以彼此相互照应,互通信息。在1857年华工事变中,揭竿而起的主要就是这一族群。他们的斗争虽然没有取得成功,却使这乡镇短暂的衰落。稍后他们在统治者布洛克的某些优惠条件下,又逐渐回归这里。迄今,这一族群仍是石隆门最大的方言群。

1970年沙捞越华族人口调查,石隆门县的8747人口中,客家人有7941人,占人口比率的90%(9成)^[4]。迄今,这一县镇人口已增加许多,但在比率上,客家人仍高居首位。石隆门县郊区的村落,如大段、到罗港、短廊等,多为客家人的聚落,这里村民建立祠堂、庙宇及学校,延续中国在海外传统习俗、神灵崇拜的文化。

在沙捞越的省县市划分未有变动之时,古晋是首府,城市居民以闽南人及潮州人为主,而郊区则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早年西成公路的十七里、十九里、二十四里等乡镇(目前这些乡镇已沿用新的村名,即新生村、来拓村及大富村),也都是客家人聚集居住之地,其日常语言交流多沿用客家方言,而且是以河婆(揭西)方言为主。这里的乡村小学,也大都由村民设立,董事会承办。客家人重视教育,尽管农村乡民收入相对不丰裕,但村民送子女受起码的小学教育是常规。也有部分学子毕业后,往城市受中学教育甚至受大学教育,而大部分则在村里从事农耕或商业贸易。

美里省的人口一直是以客家人为多,客家人在廉律(Riam Road)的聚落形态,是一个可供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村落。早期客家人移民到美里,即多落脚在廉律。1972年沙捞越州政府曾在廉律地区进行人口调查,在7个村落中,共计236户。抽样调查170户人口,客家人即占144户。当中以河婆客占132户。依此计算,170户家庭有132户是河婆客家,占77%。加上有数户大埔及新安客,则此廉律区客家人达85%^[5],是一个明显客家人聚落的村镇。

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曾到廉律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而后撰述《一个客家村镇的社会变迁:美里廉律地区的调查研究》一文,这个地区的宗族结构及家庭组织仍继续数十年来中国传统客家村落文化^[6]。但近三十年这一村镇的建设面貌已起了相当程度的变化。由于福州籍人士从诗巫、拉让江流域大量涌入美里,并且在广阔的廉律地区定居,使廉律的方言群结构有着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这一地区的居民现时仍以客家为主,但所占的比率已降低了许多。

客家人聚落形态受到社会发展的冲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古晋市郊一个早期客家人聚居的村镇。这村镇位于古晋市郊三里半至四里半的农村地带。1898年,第一批客家移民集体来到古晋,政府分配这一地区的土地给他们进行农业种植。这批客家移民主要来自广东省宝安、东莞及惠州等县份。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学校、简单的商业集市,操着共同的新安客方言,形成一个客家人的聚落。战后,沙捞越华人社会人口逐渐增加,这一客家村镇由于靠近古晋市,其地皮价格逐渐上涨,外地居民从外区进入购屋。本世纪开始,这一地区有较多的大型房屋建筑,在古晋市郊形成一个新的市镇。这说明社会变迁,方言群结构以至村落的聚落形态,也将受到时间的冲击。

三、客属社团组织的角色与功能

华人移民海外,在人地生疏的异乡环境中,靠同宗或同乡的互相济困至为重要,会馆的组织也因此而产生。华人社团的功能和角色,主要包括安顿同乡新客,互为济困与推荐就业、排解纠纷,进而举办慈善事业、购买义山以安葬乡亲。此外,华人社团也开办私塾、义学,教育同乡子弟。

(一) 社团组织的产生与分布

与其他籍贯人士一样,早期客家人移民沙撈越,创立公会乃是环境所需。古晋的嘉应五属同乡会成立于1881年^①,为客籍人士最早成立的地缘性同乡会。五属乃梅县、蕉岭、兴宁、平远与五华。这五属在广东省为纯客家县份,他们移民海外为数极众。

嘉应五属的客家人在沙撈越虽非居多数,但他们多为城市居民,因此成立公会也较早。檳城的嘉应会馆成立于1801年(其前身为“仁和公司”),也是客帮在马来半岛最早成立的会馆。

嘉应州与广东大埔县,同是纯客家县区,大埔县旧属潮州府,因此大埔人在海外往往独自组成单一县份的会馆,或与丰顺县及福建的永定县组成丰永大集团,在新加坡的丰永大组织即是一例。

古晋大埔同乡会成立于1920年,但大埔客与嘉应州客同操客语,同属一方言群体,因此当沙撈越客家公会于1934年在古晋成立时,这六个县份的客家人,以及来自惠来、龙川、海陆丰、东莞、宝安、惠阳、揭西的客家人,成立了这一方言集团大型组织,并且嘉应五属开办的公民学校与大埔同乡会开办的大同学校合并,成立越光学校,这是由小团结到大团结的表征。

1971年成立的古晋惠东安公会及1978年成立的河婆同乡会,同属操客语的方言群。揭西县河婆客家方言群中人数最众,由于揭西县早年属揭阳县区,属潮州府邑,因此不少河婆客家人在二战之前参加古晋潮州公会。惠东安公会的成员来自东莞、宝安及惠阳等县份,这些县份属非纯客家县,其成员早年也有参加广惠肇公会,一般称为新安客。1898年,首次集体移民进入沙撈越古晋三里地区进行农耕者,即属这一方言群体。^②

沙撈越许多大小城镇,都有客家社团的成立。古晋及美里两地的华族人口以客家人为多,因此这两个省份有多个客家人的会馆组织。

在中国,客家人原就善于组织社团,有些社团

甚至成为起义与革命的组织。清朝道光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革命即由客家人领导。早期移民沙撈越的客家人,在石隆门成立的“公司”也可视为一种秘密会社。一般来说,组织社团可以增进他们族群意识;客家人的族群意识看来比其他方言群强烈。他们组织社团联络乡人,一方面也是“敏锐危机感”的表现^⑦。

表2 沙撈越客家公会的分布

古晋	嘉应会馆 大埔同乡会 客家公会 河婆同乡会 惠东安公会
成邦江(斯里阿曼)	客家公会
英吉利里	客家公会
诗巫	客家公会 大埔同乡会
民都鲁	客家公会
美里	龙川会馆 大埔同乡会 客家公会 嘉应会馆 河婆同乡会
石山	客家公会
巴南	客家公会
林梦	客家公会

(二) 社团组织的角色与功能

海外华人社团功能独具特色。二战之前尤为显著。不少人在论及战前华侨社会时,多将华侨社团、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列为支撑华侨社会三大支柱。实际上,许多华文学校乃由华侨社团直接主办或赞助。沙撈越客家社团在其族群社会中扮演着福利、教育、社会与宗教的角色。

1. 福利角色

战前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大多仍保持中国的国籍,因而由他们所组成的社团,是为所在国中的外侨组织,形成一个内部自助自治以求自保的群体。可以说,自海外华人社团出现伊始,“联系友情,互助互利”就是最基本的宗旨。早年华族移民生活于异质的文化环境之中,迫切需要在生活上相互帮助,以求生存,在情感上互相交流,以求慰藉。会馆大多独立地承担起照顾乡亲生、老、病、死

^①古晋嘉应同乡会于2004年5月杪庆祝成立130周年。唯笔者于1970年代,往沙撈越社团注册局查阅有关古晋的华人会馆注册年限,古晋嘉应同乡会成立于1881年。

^②沙撈越地广人稀,第二代拉者鼓励中国移民进入沙撈越开垦种植,提供许多优惠条件。1898年一批来自宝安、东莞的农民一百多人来到古晋三里地区进行农耕,是为最早一批集体到来的中国移民。1901年更有千多名福州籍移民在黄乃裳带领下来到拉让江流域开垦。而后,广东省及福建莆仙地区集体移民,随后也到来拉让江流域开垦。

的种种职责。这包括华侨社团自行建立,并独立管理的慈善机构与义山等。即使在百年后,古晋华人社会的方言群,在他们逝世后,仍各自葬在各帮属的墓园。

事实上,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尚处于西方殖民统治时,华侨遭受层层压榨,在遭遇特殊困难时,往往不敢,也无法寄望于当地政府的支持,于是只能求助于华侨社团,乡会为此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2. 教育角色

海外华人社团对华文教育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二战之前。华文教育无法寄望于当地殖民政府的支持,故而只能自求于华人社会。以古晋为例,二战之前的华校是由各帮属自行创办学校。福建会馆创办福建义学(1912年),潮州公会创办民德学校(1916年),广惠肇同乡会创办益群学校(1918年),海南人创办崇本学校,客籍的大埔同乡会开办大同学校(1923年),嘉应五属创办公民学校(1918年),此后两校在客家公会统筹统办下合并为越光学校(1936年)。古晋客家公会在其1937年出版的《沙捞越客属公会概要》前言中即明言:“尤有进者,兴学育才,发扬祖国文化,为我侨二十余年来当务之急。故本会以吾属即以统一机关,而尚以两校分立,各自为政,视同秦越,每以为憾。遂于民国二十四年冬,依居留政府之美意,谋教育之改善,苦心孤诣,力向两校董事恳切陈词,乃合并公民、大同,而组织今之越光学校。”二战之后,古晋华人社会组成中华校董会,统筹统办各方言群所开办的学校,由校董会领导办理。大同与公民两校的合并,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二战后古晋市华校统筹统办的概念。

战前华侨在各侨民居地兴办的学校,从经费的筹措,校舍的建设以及师资聘任及课程设置等,几乎全由当地华侨社团自行筹办安排。二战之后,东南亚诸多国家先后取得独立,华人在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贡献极大,先后取得公民权,但在强势的土著民族主义操控下,华人尚须借助民间社团的努力办学,藉此维系华校的生命。马来西亚的华文中小学校,特别是民办独立华文中学,几全靠华社的承办维持,此乃海外华人社团具有鲜明自治性的例证。

为了培育同乡子弟,沙捞越客家公会大多设有奖励贷学金。古晋沙捞越客家公会即是一例。在

其宗旨中申言:“本委员会以培育专才鼓励及协助品学兼优有志向学而家境清寒之会员子女完成学业为国家社会服务为宗旨”。多年来,这类奖励贷学金的设置对后进的培育发挥了积极的效用。

沙捞越客家人多居住乡区农耕,许多乡村学校,诸如以地方命名的中华学校,多由客家人出资开办,他们在乡村成立校董会,也与客家公会维持联系,部分学校董事同时出任客家公会的理事。开办乡镇学校,对推广教育起着积极的作用。美里廉律地区廉律华文中学的创办,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地区的居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九成乃客籍人士。为了让乡村中年轻学子能有机会接受较高的华文教育,因而排除万难,筹建廉律中学。筹建委员皆为村中的客家人士。在获得广泛社会人士的支持下,在当局拨出八英亩土地作为校址之后,即开始兴建校舍,时为1966年,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培养众多乡村子弟。

3. 社会角色

华人社团同时扮演着社会角色,二战之前,各属公会各自推行文化活动。民间习俗,持续了各帮属文化的发展。当日本侵略中国大地,海外华人展开抗日救亡运动,乡会发动捐款并以人力物力支援中国抗战,参与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东南亚国家大部分被日寇占领,沙捞越亦受日寇铁蹄践踏,许多乡会领导人惨遭逮捕杀害,乡团已完全无法活动。二战之后,沙捞越处于英殖民地统治时期,许多社团扮演着反殖运动的政治角色。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不合理的法令层出不穷,华人社团联合起来反对,对政府不合理的法令措施作出纠正。一般上,客家社团都积极参与。在反殖运动时期,乡村客家人广泛参与政党活动与农民协会的组织,显示了客家人进取的一面。

结 论

客家族群是沙捞越最早的移民群。迄今客家人约占沙捞越华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祖先来自大埔、惠来、揭西河婆、嘉应五属及惠州等县,而以揭西河婆客占最多数。早期客家人从事采矿业,但他们更是著名的农耕者。由于习俗的相近,最主要为了能彼此相互照应,互通信息,早期

移民到沙捞越的客家人聚族而居。

百多年来,沙捞越客家社团凝聚了族群的力量。志愿社团作为一种维系文化的构件作用,具有社会、经济、政治、宗教与文教方面的功能,客家社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纵观客家公会的发展历程,它由点而线,由线而面,由小团结而至大团结不断地成长。二战之前,由于华族人口稀少,客家公会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古晋省,这是一个奠基时期。1941年日本侵占沙捞越,各属公会处于冬眠状态,客家公会亦然。二战之后,百废待兴,客家公会开始重振复兴,古晋以外的许多城镇先后设立客家公会。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各属公会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客家人

组成客家总会,藉以凝聚族群的力量。进入二十一世纪,面对国家社会的迅速发展,会馆乡团将会调适其步伐,在大时代中前进,可以预见的,客家社团将会继续肩负时代的使命前进。

【参考文献】

[1] 饶尚东.落地生根[A].东马客家移民史略[Z].沙捞越华族文化协会,1995.

[2][3][4][5][6]田英成.沙捞越华人社会史研究[M].沙捞越华族文化协会,2011:100.98.149.210.

[7] 郑赤琰.敏锐危机感与客家人的政治成就[A].客家源远流长—第五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C].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出版,1999.

【海外侨讯】

保护华人老街 马来西亚相关组织拟为吉隆坡茨厂街申遗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吉隆坡小贩商业公会准备向政府提出申请,把具有文化和旅游特色的重镇茨厂街,申请列入国家文化遗产,以保护这条具有“历史任务”的老街,使之再现光辉。

该会主席洪细弟近日在茨厂街举行庆祝61周年纪念晚宴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获得出席晚宴的马华总会长廖中莱的支持。

准备通过马华申请

洪细弟说,该会准备通过马华提出申请,确保茨厂街能永远保存,并让后辈了解先贤创业的艰辛。他说,这老街具有百年历史,周围有百年老庙、百年建筑物,应获得共同保护。

廖中莱说,马华愿意协助茨厂街打造为一个更具生命力的旅游和文化区,发挥更大的吸引力。

他说,目前茨厂街已成为世界闻名的旅游区,希望继续获得各界的支持,与政府建立更密切合作,这样会把老街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方天兴:会庆显示万众一心

华总总会长方天兴说,吉隆坡小贩商业公会成

功在茨厂街举办会庆,证明此举已获得了大家的支持。

他说,吉隆坡的历史比马来西亚独立的时间还久,也是华裔先贤拓荒、成家、兴业、结社和参与国家发展的最典型的例子,而茨厂街更是一步一个脚印,见证了华人参与老街的发展。他希望能全力支持洪细弟,以便共同维护老街未来的发展。

方贵伦:应注重老街治安清洁

行动党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说,茨厂街具有百年历史,是游客必到之地,为国家赚取了丰厚外汇。

他相信一旦老街提高治安及清洁,特别是吉隆坡市政局给予配合,会有另一番新貌。他希望市政局能提供适当奖励措施,如为历史性的建筑物,豁免门牌税等。

(来源:2014年06月17日中国新闻网/本刊辑)